

版)。他指出,作为代表豪族地主和富商大贾的外戚集团的头子,王莽性格怪异、虚伪、奸诈、阴毒、残忍,特别娴熟法家之“术”,把剥削阶级那种贪婪残暴、尔虞我诈的品性发挥到极致,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具有独异色彩的典型。王莽的品格和手段,适逢各种条件构成的历史机遇,就使骗子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由此孟祥才断言,“笔者并不认同封建史家以封建伦理为准则对他所作的评判,但也无意为他做翻案文章。面对他所制造的历史灾难,史家的良知无法让我对他写出哪怕最低调的赞美辞”(《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这一结论道出了一个富于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心声,值得所有从事王莽研究的学界同仁深思。

综上所述,为将王莽与新朝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果,笔者得出了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尊重第一手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避免无意义的重复劳动,核心就是回归原始文献。在没有更新、更权威的考古发现或史料可以推翻班固记载的前提下,应坚持以《汉书·王莽传》及相关篇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避免理论预设和主观臆断,从文本解读入手,认真进行考证、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权威,而是坚持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的指导思想与科学的方法论,本着忠于史料、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力求深入、全面、客观、公正地进行研究。

20 世纪以来九品中正制研究综述

李毅婷

(清华大学历史系 北京 100084)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一直备受瞩目,相关论著和论文皆不少见。杨筠如的《九品中正制与六朝门阀》(商务印书馆,1930年;以下凡引述已注作品的观点,不复注)是民国以来第一部专论九品中正制的著作。此后最可注意者,当属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与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东洋史学会1956年,中华书局2008年中译版)。这两位先生的研究,尽管有些观点仍值得商榷,但观点和思路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现兹据所见,分门别类,综述如下。

“九品中正制”的称谓与性质

(1) 称谓。学界一般采用“九品中正制”的提法,少数学者主张称为“九品官人法”。

虽然宫崎市定和陈长琦都主张改称“九品官人法”,但二者观点实质上完全不同。宫崎氏认为“九品官人法”与“九品中正制”实为同一制度,前者更能体现乡品九品、官品九品与这个制度的关系。陈长琦认为,中正九品制或者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二者不可等同或者相互取代,为了深入研究九品官人法,应当放弃“九品中正制”的错误概念(《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魏晋九品官人法释疑》,《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6期)。

尚志迈《“九品中正制”称谓辨析》(《张家口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指出陈群对“九品”的发展之处在于将区分官更高下品级的规定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提出,因而正确的称谓应该是“九品官人法”、“九品制”或“中正九品制”。胡舒云《九品官人法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也认为应当称为“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之类的名称突显了中正官在该制度中的关键作用,把中正官与九品之制相提并论,并不符合事实。

以下按惯例仍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对于学者所采用的称谓,则一仍其旧。

(2) 性质。在该制度的性质上,学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为一种选官制度。宫崎市定认为,九品官人法是司徒府和尚书合作进行的选举法,是一种选用人才的制度。陈长琦认为,九品官人法是魏晋时代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唯一形式。胡舒云《“九品官人法”性质辨析》(《东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认为九品官人法制度是一个包括考察品评、选授官职完整过程的选拔人才制度。

第二,认为只是整个选官制度的基础。唐长孺《南北朝后期科举制的萌芽》(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保证清浊分流,不等于选举制度的全部;中正的品第是各项选举的依据,但还得通过各条入仕途径入仕。罗新本《两晋南朝入仕道路研究之一——两晋南朝的“直接入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的观点与此相近。他将九品中正制与“直接入仕”区分开来,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一种考察士人和官员的制度。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认为,中正品第是入仕的前提条件,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选官制度的基础。汪征鲁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当时选官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略论九品中正制在两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汪氏引入系统论,将选官系统看作一个涵盖五个子系统在内的母系统,九品中正体制只是其中的考核系统(《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石荣伦《九品中正制二题》(《江海学刊》1997年第3期)认为,九品中正制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选拔制度的一个环节,是入仕的前提条件;士人获得“乡品”之后,仍需通过察举等途径方可入仕。

九品中正制创设时间

关于九品中正制创立的时间,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延康元年(公元220年)陈群始建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杨筠如、宫崎市定等都持这一观点。李则芬《九品中正制度》(载《两晋南北朝历史论文集(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认为沈约《宋书·恩倖传序》不足为据,且在曹操用人唯才、不问品德的原则下,不可能实行尚门第、品德的九品中正制,因而陈群之前不可能已有先例。

第二,魏武创建说。韩国磐依据《宋书·恩倖传序》、《晋书·卫瓘传》和《通典·选举典》等相关记载,认为是曹操在戎马倥偬时所创(《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三,魏武萌芽说,是对延康元年陈群始建说的一种补充。唐长孺在《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中主张延康元年陈群始建说,但在《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中修正了这一看法,认为在建安年间已实行,只是并未普遍推行且未形成制度。吕思勉也认为是陈群根据权立之事制定为法(《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刘访师《九品中正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九品官人法是曹操在公元192年的寿张之战时在军中创建,直至公元220年九品中正制被定为国家人才选举制度,经历29年的萌芽期。张旭华《关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认为萌芽于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荆州之时,发展、完善于曹丕继任魏王之前,确立于魏初延康元年。陈长琦认为,汉末魏初已经开始酝酿九品官人法,陈群只是将曹操推行的部分制度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并推行于全国(《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胡舒云《九品官人法考论》认为,将其创立过程概括为萌芽于曹操,确立于曹丕,可能更为确切。

创立原因与目的

多数学者从人才品评、选举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杨筠如认为,九品中正的设立是时势的要求,汉末的党祸与清议可以说是最大原因,汉末政局的混乱只是一个偶然近因。宫崎市定认为,设立“九品官人法”是为了有条件吸收汉官、排除污浊分子和反魏分子。熊德基认为,宫崎氏的这一看法完全出于个人臆断。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也认为,宫崎氏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当时的大多数官员早已取得在魏为官的资格,根本无需用九品官人法来审查。陈氏认为,九品官人法的出台是曹操“唯才是举”思想中的人才甄别思考的法典化,还受到了东汉以来区分人才品级的思想和具体做法的直接影响。

沈任远《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认为,汉末察举弊端丛生,且大乱之后,人口迁移,难以考核,因而创立九品中正制。韩国磐的观点与此相近。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以下简称《试释》)指出九品中正制的创立未必是为了巩固门阀统治,从人士流移和乡闾评定传统考虑创立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正的设立是曹氏既想抑制浮华和名士的清议又不得不与大族名士妥协的重要表现。后来,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又进一步阐述,认为九品中正制的设立

既是个创举,又是传统大姓名士品评人物、主持乡议与曹操全部选举政策的继续。吴慧莲《曹魏的考课法与魏晋革命》(《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1993年)认为,陈群制定九品官人法,也有裁抑各级地方长官的人事权,加强中央的目的。胡宝国《必然的走向——九品中正制》(《文史知识》1998年第11期)也认为九品中正制表面上是继承东汉以来品评人物风气,实质上是限制和破坏这种风气。

张旭华《曹魏九品中正制再探讨——与王晓毅先生商榷》(《文史哲》2008年第6期)认为,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是为了使士人流徙和注重乡论相统一,使那些因战乱影响未能入仕者得以入仕。王晓毅《再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文史哲》2010年第2期)对张旭华的商榷作了驳议,认为陈群建立“九品官人法”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一是通过中正之品赋予曹丕集团位于实权岗位的官员更高的等级,增加当权派的凝聚力;二是通过中正之状,对官员德、才两方面作出评价,以调和曹魏集团内部在人才问题上的重德和重才意见之争。

少数学者从政治斗争入手,认为九品中正制的设立是曹丕为了代汉而让步于世家大族的结果。代表作有王仲荦、陈清泉与郑天祿的《略论“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病及其影响》(《学术月刊》1980年第9期)、游为民《九品中正制创立原因辨析》(《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武沐的《对九品中正制让步之说的置疑》(《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则认为并不存在让步。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有多方面原因。石荣伦《九品中正制二题》(《江海学刊》1997年第3期)认为,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有四个原因:一,纠正世家大族及名士对人才评定和官吏选拔的垄断;二,纠正人才标准的偏差;三,终极目的是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非个别阶层或少数政治集团的要求;四,历史的延续性。胡舒云《九品官人法考论》认为,九品官人法的创立,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社会政治和教育的需要、察举流弊、选举制度自身发展的规律、先秦以来的人才价值观、选贤任能论、汉末以来的名实论、才性论及汉末人士流徙等;此外,传统文化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此外,设立州中正的原因与目的也是学者讨论的焦点之一。唐长孺认为,州中正设立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到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之间,只能是地方大族势力扩大的结果。宫崎市定认为,大概设立于嘉平元年前后,之后裁定乡品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中央,九品官人法变得更加贵族化。胡宝国同意唐先生的观点,并指出州中正的设置是要使乡里清议摆脱地方著姓的控制(《魏西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毛汉光同意矢野主税的观点,认为司马懿设置州中正与排除亲曹分子有关(《从中正评品与官职之关系论魏晋南北朝之社会架构》,《史语所集刊》第46本第4分册,1976年)。吴慧莲认为,司马懿设立大中正是为了加强中正职权,借以笼络地方大族,从而击败曹爽集团。汪征鲁则认为,司马懿于正始元年设立州(大)中正实质是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九品中正体制的控制。王晓毅《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文史哲》2007年第6期)认为,州都到州大中正不是新官职的设置,而是名称的变化,也应当视为职能由监督官员转变为直接评审。

中正的设置与职权

(1) 中正的设置。史籍上对于中正的设置有几种不同的记载,由此产生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太平御览》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州置都而总其议。张旭华《关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几个问题》采用此说,认为魏初设有郡中正和州都,无县中正和州中正,司马懿加置州中正之后,州都、州中正和大中正成为一名异称。

第二种,杜佑《通典》14卷《选举二》: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卷32中正条又云: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杨筠如主张此说,认为直到西晋才完备,且邑中正就是县邑中正。沈任远也赞同此说,但认为大小中正之分直至魏末司马懿加置州大中正才出现。罗新本认为西晋时郡有大小中正,县可能也有小中正(《晋书·李含传》中所见的魏晋选官制度,《天府新论》1996年第2期)。王仕举《九品中正制再探》(《重庆师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中正官似应为州有中正、大中正,郡、国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县邑设中正、大中正、小中正。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否定这一观点,也驳斥王伊同、杨筠如关于邑即县邑、邑中正即县邑中正的看法,提出两晋南朝邑中正即郡国中正,认为在延康元年至正始元年之间,存在州都、郡中正二种职务,州中正是州大中正的简称,州仅有大中正一职,郡(国、邑)有大小中正。

第三种,杜佑《通典》14卷《选举二》载: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宫崎市定认为,魏朝最初只设郡中正,魏末根据司马懿的建议才设置了州中正。他还驳斥杨筠如将邑中正当作县中正的观点,认为郡国中正即邑中正,在魏晋南北朝没有县中正一职。唐长孺《试释》结合这三种记载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州都、大中正、州中正是一名异称,陈群创制之时,只有郡中正,州中正的设立时间较晚,而县中正在魏时并不可考。

第四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8“九品中正”条云: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李则芬认为,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韩国磐结合第三、第四种记载,认为中正分州、郡两级,说“州设大中正,亦称都中正,郡设小中正,亦只称中正。”

(2) 中正的职权。中正具有品评权已是学界公认的看法,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有分歧,尤其是在品评权是否完整上。

唐长孺《试释》认为,中正的主要任务是品第人物,作为政府用人的根据;除了皇帝特权处理之外,所有官职的授受都必须经中正审查;中正品第与入仕途径及任职密切相关,即官位必须与品第相符。王仲荦认为,中正专管搜荐,依据辖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九品并有权进退;吏部根据中正的“品状”来选用人才。这已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为教科书所采用。宫崎市定认为中正品评对象包含未入仕者和现任官员,经由察举、试经等考试获得的品第也由中正授予;随着尚书权力的上升,中正的权力越来越小。陈长琦《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批判这一观点,认为中正品评只是魏晋士人获得品第的渠道之一,察举、试经都是获得品第的独立渠道。沈任远认为,中正只有品评权和荐举权,无用人权。万绳楠认为,中正起初并不掌有完全选举权,到了

西晋之后才掌有完全的人才选举权(《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刘访师认为,各州、郡、邑的中正,在司徒尚书领导下,掌管辖区内的人才选举事务。李则芬认为,郡小中正负责品第人才上报大中正;大中正负责核实后上报司徒,并有权与尚书力争,还可升降品第。

汪征鲁《略论九品中正制在两晋选官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中正最基本的职责与权力为定品,但并没有完全的升、降品权,高门士族、达官显宦、乡论清议还有上层社会的舆论都可为之;东晋之后,随着门阀士族力量的日益膨胀,其权力越来越小。王晓毅《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认为,中正只是曹魏官员任职资格认定系统之一(另一个是行政长官),中正作资格审查时,为在职官员定“品”,为察举对象论“辈”而不定“品”,直至魏末改革才可品评未入仕人员,有时在诏书授权下甚至获得独立的荐举权、提名权。

关于中正品第的标准,唐先生《试释》认为,魏时家世已是中正品第的标准之一,但还不是唯一标准;西晋期间家世才成为主要标准,重才德的“状”作用不大。万绳楠认为,魏明帝时中正品年第已开始注重名望,齐王芳时已有人主张据“伦辈”即据门第选举;西晋时门第、官资成为选举的唯一标准。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与官僚制》(收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日本汲古书院,1997年,中华书局2010年中文版)从思想史角度作了解释,认为六朝时“清浊”与“昼锦”的价值观,使得官员个人的才能遭到忽视,家世成为遴选标准也与时人对官职的特定认识紧密相连。

中正除了品评权,唐长孺《试释》认为还可委任州主簿及从事;李则芬认为还掌管行状以备定谥之用;胡舒云、李晨光《“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认为还有表率乡里、敦行教化和化民正俗的职责。

中正品第的称谓及其与起家官品的关系

学界存在两种中正品第称谓:乡品、资品。宫崎市定最早提出把中正品评候补官员的品第称为乡品,把九品官制的品称为官品。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认为,应当将中正品定的官吏侯补人的“品”称为资品,以突出门第及父兄官爵在中正品评中的重要地位。张旭华反对用“资品”称呼中正品第,认为晋代所言之“资”有家世门阀、任官资历和中正品第三种含义;“资品”连称通常指官职升迁时对官员资历和所获乡品的综合要求,并非专指中正品第一项(《两晋时期的“资品”与官职升迁制度》,《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2)。王晓毅《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采用“资品”的称谓,认为,草创时期中正之“品”具有“官品”与“资品”双重性质,与家世无关,魏末改革后才转化为“官品”;夏侯玄《时事议》中的“辈”是曹魏时期针对州郡察举对象的术语,并不等同于“品”。

关于中正品第与起家官品的关系,也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乡品或资品与起家官品存在级差。宫崎市定认为在乡品和起家官品之间大致存相差四级的原则,在实施中允许酌情调整上下一个品级。宫崎氏认为,乡品还决定了晋升限度,突破这个最高限定,需要请中正修正乡品。唐长孺也认为,降品等于免官,升官必须同时升品。

陈长琦认为宫崎氏的四级差说失之粗糙。他认为,特定资品与起家官品间确实存有大致

的对应关系。曹魏时期二者的对应关系是相差三品。西晋以后,资品二、三、四品与起家官品基本确定为相差四品,资品五品与其起家官品在相差三品到四品间浮动,资品六品与其起家官品始终保持相差三品的距离(《魏晋南北朝的资品与官品》)。

张旭华《魏晋时期的上品与起家官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宫崎市和陈长琦的共同问题是未区分乡品中的上品与下品。他认为,魏晋时期乡品在三品以下者与起家官品的关系大体如陈文所示,但上品二品与起家官品间的对应关系是高低不等的,在任官层次上有很大的差异性。汪征鲁认为官品与乡品是在按阶段范围上、在大的趋势上对应的,且在魏、西晋时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入南朝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王晓毅同意西晋资品与官品存在级差,其来源是父辈的官品成为子弟的起家资品并相差四等。

第二种,认为不存在四级差。胡宝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认为,具体的官职与中正品第相关联,获得上品者可以担任太子洗马等官职,这些官位的人往往升迁很快,获得上品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一文赞同这一观点,同时驳斥宫崎市提出的关于魏晋贤良秀孝的策试等第、任官和乡品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九品中正制的作用及影响

在评价九品中正制上,学者们多关注其与门阀制度的关系,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九品中正制从创立伊始即为门阀统治服务。陈清泉与郑天祿认为,“九品中正”是两汉豪强势力发展,尤其是东汉末年门阀制度形成的产物。他们认为九品中正制巩固了门阀特权,加剧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矛盾,当时政治纷乱、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皆与之密切相关。王仲荦认为,“九品官人”之法从世家大族的要求出发,其继续执行便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万绳楠认为,九品中正制进一步巩固世族和儒门的地位、排斥庶族和新官僚,是选举上的大倒退。

第二种,九品中正制创立伊始有加强中央选举权的意图,但逐渐成为维护门阀制度的工具。杨筠如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创立之时,用意未尝不好,但只知乡里清议的可贵,却不知限制其权威,反而走向反面。宫崎市定认为,曹魏九品官人法本来纯粹是为了摆脱门阀、根据德才选拔人才,却从实施之初就具有贵族式的运作方式,州中正的设置则加重了这种倾向。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创立之时,虽有收回选举权的企图,却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保证了士族的世袭特权;在门阀制度确立并为区别士庶制造了理论根据之后,成为例行公事。张旭华《试论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弊病及其作用》(《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认为,九品中正制在设立州中正后开始出现门阀化倾向,门阀制度确立之后,成为巩固门阀政治和士族世袭特权的重要工具。他将九品中正制作为门阀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韩国磐认为,九品官人的办法起初按照“唯才是举”原则,获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不久就演变成士族把持选举、操纵政治的工具,由此形成了门阀政治。韩氏认为,它只适用于分崩离析的时代,不适用于统一安定的时代,但不可否认它确实曾经起过作用。刘访师认为,公元220年到280年间,是它的隆盛时期,破除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但蜕变成以门第为品第基础后,成为压抑

人才的工具。究其原因,是它扎根于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且符合统治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只要社会经济制度未变,它就不会消灭。

胡宝国《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认为,西晋时九品中正制仅是保证了当时的高官显贵的世袭特权,从而在势族的形成以及势族向世族的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汉代的任子制也有类似作用。他认为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其与任子制的关键区别,建立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却成为特权制度,是其一特点。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认为,九品中正制可以分为性质有所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在曹魏、西晋初期,仍不失为“论人才优劣”;东晋南朝,更趋于“谓士族高卑”,其作用也由积极转向消极。胡舒云《“九品官人法”性质辨析》认为,从创立的初衷和基本精神及其制度体系看,它是一个进步的选举制度;从制度体系看,它较察举制度更严密、合理;从实施中的诸多弊端看,它的确成了门阀势力维护特权的工具。胡氏还认为,公然在制度上将“门第”作为选举标准,确为它所独有,这是东汉以来逐步形成的豪族地主、累世经学的官僚地主,以及在乱世中新崛起的权贵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结果,同时也有思想和教育上的原因。颜晨华认为,九品官人法固然在制度上促进了门阀士族的发展与强盛,但实质上并不是士族世代不衰的保证(《经学传统与汉唐北方士族的盛衰》,《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中村圭尔认为,六朝时的九品官制虽然表面是一种相当完善的官僚制度,但却是作为官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发挥作用的,因为它可让官人地位所表示的身份具有普遍性。陈金凤和方潜龙从皇权角度出发,认为魏晋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发展、衰落都与皇权密切相关,虽然其与门阀士族政治相结合,并服务于门阀政治,但皇权一直对它顽强地发挥作用与影响力,并最终导致其衰微(《魏晋南朝九品中正制与皇权政治》,《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此外,吴霓《论魏晋九品中正制与私学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发展的角度讨论九品中正制,认为这是选举制度史上的又一变迁,客观上促进了包括医学、书法、天文、地理等在内的家学的兴盛,促进了家诫、家训这类家庭教育形式的发展,还促进了儒经私学的兴盛。但吴文并没有解析九品中正制如何促进家学。

到目前为止,有关九品中正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研究焦点主要围绕着中正一职;注重具体细节的考证;有一定的思维定势,门阀士族成了九品中正制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注重从政治角度入手,从思想文化角度探讨这一制度的研究仍然较少;在一些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因而九品中正制仍有可探讨和深入研究之处。

欢 迎 投 稿